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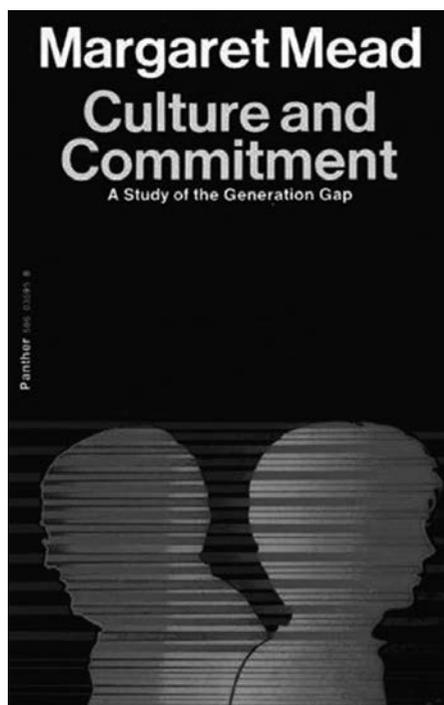
# 有關《文化與承諾》中譯本的評述和重新解讀

● 王鳴雷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米德 (Margaret Mead) 於 1970 年出版了《文化與承諾》(Culture and Commitment) 一書，該書於 1972 和 1977 年重印，改名為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以下簡稱「原著」，引用只註頁碼) ①。米德成長於美國費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母親則為爭取婦女權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處奔走。米德於 1923 年在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獲得了學士學位，隨後，她師從有「美國人類學之父」之稱的博厄斯 (Franz Boas) 教授，在研讀人類學博士學位期間遠赴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從事田野工作，並於 1929 年獲取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米德將其一生致力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是美國現代人類學成形過程中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②。她平生出版專著及合著共二十餘部，其中，《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新幾內亞人的成長》(*Growing up in New Guinea*)、《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等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③。1978 年逝世後，米德隨即獲授總統自由勳章。

在《文化與承諾》中，米德通過對不同代際間的行為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對立、衝突進行描述和分析，從而精闢地



*Culture and Commitment* (1977)

對代溝問題做出了概括及闡述。她所描述及定義的「三喻」文化模式，直至今日仍然有助我們有效地了解過去、洞悉當下和指導未來。該書於1980年代被翻譯並引進中國大陸，中譯本名為《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以下簡稱「中譯本」，引用只註頁碼），由周曉虹、周怡翻譯<sup>④</sup>。應該說，河北人民出版社能夠在1980年代意識到該書觀點的巨大價值並出版中譯本，這種對學術發展趨勢的敏銳觸覺以及對未來的預見性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是在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也不可否認該書對國內社會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也正是由於中譯本的出現，使我們不禁會將譯本同其原文進行對比分析，以便更加精確地理解和領悟原著的思想。

可是，在這樣的比較中，卻令我們不得不對中譯本的內容感到失望。這樣的失望主要是源自該書中譯的準確性問題，具體體現於對原著核心概念的翻譯和理解，以及全書整體上的翻譯準確程度。本文接下來將以這兩個方面為線索，對原著和中譯本進行比較和分析，並希望這樣的再次解讀能夠使米德著作更加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 一 核心概念的錯譯與學界的持續引用

米德在原著中提出了三個重要的核心概念，分別是：「後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及「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它們分別描述了構築在不同文化傳遞機制基礎



《文化與承諾》(1987)

上的三種形態各異的文化模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概念是針對1960年代發端於美國並迅速波及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叛逆、社會動亂，以及由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全球性、歷史性的代溝等現實問題而提出的<sup>⑤</sup>；而面對當今世界，隨着社會發展速度的迅猛，每一代人都無時不在感受着周圍所發生的變革以及它們對人類自身所帶來的影響，而米德所提出的這三種文化模式則再次為人類文化在當下的進步與發展指明了方向<sup>⑥</sup>。可是，中譯本卻將“postfigurative culture”翻譯為「前喻文化」，而把“prefigurative culture”翻譯為「後喻文化」。對這些重要概念的錯譯所造成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的文章、文獻數據庫（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等）、互聯網搜索引擎以及詞庫中隨處可見。為了準確地理解、運用及傳遞米德的思想，我們必須依託原著的內容重新進行審視。

順便提及一下，米德1978年對原著進行了增訂，出版了*Culture and Commitment: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the 1970s*，章節編排稍為不同<sup>⑦</sup>。這一增訂版也有中譯本，名為《代溝》<sup>⑧</sup>。在《代溝》一書中，“postfigurative culture”和“prefigurative culture”這兩個概念，分別被譯為「後象徵文化」及「前象徵文化」。這種翻譯方式基本表達了作者的原意，但它並沒能像1987年中譯本那樣，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產生巨大而廣泛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從下文所援引的文獻中看出），筆者認為原因也許有二：首先，鑒於1987年中譯本早《代溝》一年出現於中國大陸，人們或對前者存在先入為主的心理；其次，或許是人們對權威的盲目信任和崇拜所致。因此，《代溝》並未起到「撥亂反正」的效用。再加之長期以來，由於國內並沒有學者對1987年中譯本中的錯誤翻譯加以澄清或進行更正，這便導致國內公開發表的學術性文章和互聯網文章對於米德提出的相關重要概念，持續引用錯誤的翻譯，而這樣的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一直延續至今。

例如，早在1988年，周曉虹曾在其〈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一文中率先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他將其定義為「在急速的文化變遷時代所發生的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進行廣泛的文化吸收的過程」<sup>⑨</sup>。從概念上看，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文化反哺」的理論依據其實是源自米德所提出的「前喻文化」概念，然而在周曉虹的〈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親子傳承〉一文中，他卻指出，「文化反哺」的概念是基於米

德「後喻文化」的內涵，而在該文中所援引的「後喻文化」概念也正是來源於他在1987年所翻譯的中譯本<sup>⑩</sup>。從以上兩篇文章能夠看出，周將「文化反哺」的概念同他先前所錯譯的「後喻文化」概念劃了等號。

不僅如此，基於該翻譯錯誤而產生的「文化反哺」概念也從1980年代起一直延續至今，比如，周怡對代溝問題的闡述便是基於周曉虹所提出的「文化反哺」概念，她指出：「……這種經由『文化反哺』而引起的趨同傾向同樣為我們跨越代溝架設了橋樑。」<sup>⑪</sup>另外，黎春嫻也曾以「文化反哺」概念為基礎，對社會適應問題進行分析：「文化反哺是一種逆向的文化傳遞模式。老年人向年輕一輩不僅學習一些新器物、新技術的使用，而且有對新現象的理解，新觀點的接受，涉及文化的各個層面。這種文化反哺過程，不僅有利於和諧家庭關係的構建，而且有利於促進老年人的社會適應能力。」<sup>⑫</sup>

更為驚人的是，由於中譯本中有關米德核心概念的錯誤翻譯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及時的澄清與更正，這樣的誤用甚至蔓延到了教育研究領域當中。我們且以鄭金洲的〈教育反哺芻議〉一文為例，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教育反哺」概念正是基於周曉虹所提出的「文化反哺」概念：「教育反哺是子代向親代傳遞知識、進行教化的逆向教育過程。隨着『後喻文化』時代的到來，教育反哺正成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論及「教育反哺」與「文化反哺」的關係時，他說：「教育反哺是文化反哺的核心和表現形式。它的出現與自立，使文化反哺得以實現，同時也通過教育自身的引導作用，緩解

文化反哺所帶來的代際衝突，調節文化反哺的目標、內容和方式等。」<sup>⑩</sup>從上可見，鄭金洲在對「教育反哺」的論述中，分別引用了中譯本錯誤的「後喻文化」概念，以及周曉虹基於同樣錯誤概念（「後喻文化」）而提出的「文化反哺」概念。

又如，肖正德在〈生態取向教師學習方式變革：時代境遇與實踐路向〉一文中，對生態取向教師學習方式變革背景進行分析時指出：「隨着後喻文化的到來，年輕一代即將成為文化的主體，教師不可能時時處處保證給予學生正確的指導，教師必須真正把學生當作『對話』的夥伴。後喻文化強調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強調師生共同發展與成長。可以這樣說，生態取向的教師學習方式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後喻文化作用推動的……」<sup>⑪</sup>除此之外，該文還大量引用了中譯本錯誤的「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概念及相關解釋。

上述例子讓我們見證了中譯本對米德核心概念的錯誤翻譯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的廣泛而負面的影響。可以說，這個譯本引發了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在相關學術領域中對「後喻文化」及「前喻文化」概念的持續誤用。因此，對於澄清和更正如此重要且在當今國內社會被廣泛引用的概念是極為重要的，這也是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 二 對原著核心概念的重新思考

米德原著共分三大部分：過去（The Past）、現在（The Present）和未

來（The Future），而這三部分所分別對應的人類文化發展模式分別為「後喻文化」、「同喻文化」以及「前喻文化」。對這三個重要概念，她給出了如下澄清：

The distinctions I am making among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e—postfigurative, in which children learn primarily from their forebears, cofigurative, in which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learn from their peers, and prefigurative, in which adults learn also from their children—are a reflection of the period in which we live.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small religious and ideological enclaves are primarily postfigurative, deriving authority from the past. Great civilisations, which necessarily have developed techniques for incorporating change, characteristically make use of some form of cofigurative learning from peers, playmates, fellow students, and fellow apprentices. We are now entering a period, new in history, in which the young are taking on new authority in their prefigurative apprehension of the still unknown future. (頁31)

從原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米德所描述的「後喻文化」是指晚輩向長輩學習的文化模式，這樣的文化模式主要集中於原始社會和那些特殊宗教或意識形態主宰的小飛地，他們所尊崇的權威來自於過去；而「前喻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年輕人學習的文化模式，在這樣的文化模式中，年輕人憑藉着他們對未來未知世界的前喻式理解獲得了新的權

威，而如今我們恰恰正在步入歷史上這樣一個全新的時代。

與原著相比，國內普遍流行的對於「後喻文化」及「前喻文化」的翻譯和理解，恰恰與米德的原意完全相反。按照米德的原意，我們如今所處的時代應該是「前喻文化」時代，絕非長期以來我們所認為的「後喻文化」時代。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英文詞義的角度來理解和重新思考米德提出的這些概念，或許會更加清晰明瞭。“Postfigurative”（也作“post-figurative”）同“prefigurative”（也作“pre-figurative”）分別由前綴“post”和“pre”與“figurative”相加構成。兩個前綴“post”及“pre”分別表示在時間順序上的「後」和「先」，而“figurative”在漢語中則有比喻的、象徵的含義<sup>⑤</sup>。同時，在英文近義詞解釋中，“figurative”與“metaphorical”（比喻的、象徵的）相近<sup>⑥</sup>，具有利用對一種事物的描述來指代另一種十分相近的事物的含義<sup>⑦</sup>。因此，米德所提出的“postfigurative culture”從文化模式上來講，是一種已經被定義和象徵後的情形，在這樣的文化中已經存在了一種固定的、被人們所廣泛接受、認同並傳承的生活方式。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樣：

A postfigurative culture is one in which change is so slow and imperceptible that grandparents, holding newborn grandchildren in their arms, cannot conceive of any other future for the children than their own past lives. The past of the adults is the future of each new generation; their lives provide the ground plan. The children's future

is shaped in such a way that what has come after childhood for their forbears is what they, too, will experience after they are grown. (頁31)

正是在這樣發展極其緩慢且變化極其微弱的文化形態中，成年人的過去便成為了新生一代中每個個體的未來；他們的生活經歷和軌迹為青年人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參照，孩子的未來就這樣按照長輩曾經的生活經歷而塑造起來。這樣一來才會形成了晚輩向長輩不斷學習的文化模式，即「後喻文化」。他們彷彿以自身的一舉一動詮釋和代表着老一輩人所傳承下來的文化原型。

同理，我們可以推出米德所提出的“prefigurative culture”從文化模式上來講，是還未被定義和象徵的情形。在這樣的文化中並不存在某種固定的、沿襲的生活方式，人們完全處於一個未知的世界。正如米德所說：

Today, suddenly, because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re part of one electronically based, intercommunicating network, young people everywhere share a kind of experience that none of the elders ever have had or will have. Conversely, the older generation will never see repeated in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eir own unprecedented experience of sequentially emerging change. This break between generations is wholly new: it is planetary and universal. (頁89)

的確，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在一瞬間都成為了以電子化為基礎、相互溝通的網絡之中的一部分，年輕人無處不在地分享着任何老一輩人

都未曾也將不會擁有的經歷。與此相反，在如今年輕人所生活的時代中，老一輩人將再也無法看到那些曾經有序發生的變化，而以往的經歷對於他們自身來講卻曾是史無前例的。這樣，代際之間的斷裂是全新的、全球性的、具有普遍性的。在這樣的文化中，即便是那尚在孕育於母親腹中的孩子也會成為未來的象徵，孩子而非其父輩和祖輩將會代表着未來的發展趨勢。年青一代將充分地自由行使着主動權，並且能夠在這未知的世界中為長輩引領方向。也正因如此，當今時代才出現了長輩反過來向年輕人學習的文化模式。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原文的意思還是從英文詞義的角度來看，我們當今所處的都應該是米德所描述及定義的「前喻文化」時代，而並非「後喻文化」時代。基於以上的分析，也再次印證了中譯本對於米德原著所定義的“postfigurative culture”及“prefigurative culture”的翻譯是錯誤的（意義顛倒）。

### 三 典型翻譯錯誤舉隅

通過以上對米德原著中核心概念的重新解讀，似乎讓我們對該書有了更加合理的認識。然而，這樣的分析也使我们頓時產生了疑慮：是否在中譯本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對米德本意的誤解呢？事實證明，這樣的疑慮並非杞人憂天。中譯本的確還存在着其他很多不盡人意之處。據筆者的統計，除核心概念之外，全書出現的翻譯錯誤（88處）、翻譯不當（66處）、邏輯錯誤（9處）、

段落和語句缺失及漏譯（6處），共計169處。由於受篇幅的限制，下面我們只將中譯本中部分典型錯誤（核心概念除外）分類列舉（「原譯」部分為中譯本的錯誤翻譯，「現譯」部分是筆者做出的更正）：

#### 一、翻譯錯誤

（一）字詞片語誤譯（誤譯處在「原文」中以黑體標出）

1. ◎原文：... adolescents and young men have gone away to work for Europeans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頁72)

△原譯：15 (頁61)

★現譯：50

2. ◎原文：... as Jews and **Armenians** have done. (頁45)

△原譯：美國人 (頁38)

★現譯：亞美尼亞人

3. ◎原文：... in the name of **each successive adolescent group** ... (頁83)

△原譯：成功的年輕群體 (頁70)

★現譯：每一代青年群體

4. ◎原文：... the use of detail to **flesh out** the memory of events ... (頁51)

△原譯：消除 (頁44)

★現譯：(使) 充實

5. ◎原文：The response was as slight as that of the blind to the different feel of **sunlight** sifted through tre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leaves ... (頁37)

△原譯：月光 (頁32)

★現譯：陽光

（二）整句誤譯

1. ◎原文：I was reared almost seven decades ahead of my time ... (頁118)

△原譯：現在，我已快進入古稀之年……（頁100）

★現譯：我的成長經歷同當時所處時代相比彷彿超前了將近70年……

2. ◎原文：It is the question that we do not know.（頁116）

△原譯：問題就是我們一無所知。（頁98）

★現譯：可我們就是不知道問題是甚麼。

3. ◎原文：The way in which children learn languages from their elders defines how as adults, they themselves will be able to learn new languages.（頁44）

△原譯：晚輩向自己的長輩們學習語言的方法規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這些晚輩們也能夠去學習新的語言。（頁38）

★現譯：孩子們像長輩們學習語言的方式也同時限定了成年人自身學習其他新語言的方式。

## 二、翻譯不當

1. ◎原文：Their postfigurative indoctrination already contained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ete transfer to another society.（頁43）

△原譯：他們所受的前喻文化薰陶已使他們能夠完全適應另一社會。（頁37）

★現譯：他們的後喻文化教導中已經包含了一種向其他社會徹底轉變的可能。

2. ◎原文：But the prototype postfigurative culture is the isolated primitive culture ...（頁49）

△原譯：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卻是孤陋寡聞的原始文化……（頁42）

★現譯：但是後喻文化的原型卻是那種與世隔絕的原始文化……

3. ◎原文：In both cases a new element enters the situation.（頁79）

△原譯：應該說這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頁67）

★現譯：在以上兩種情況中，一種新的因素隨之產生了。

4. ◎原文：... children are also the authorities on the new ways ...（頁82）

△原譯：……晚輩們也通過新的途徑獲得了權威……（頁69）

★現譯：……孩子們在新的環境和領域中也成為了權威……

## 三、邏輯錯誤

1. ◎原文：We find the suicide of the fortunate and the gifted, the individual who feels no abiding and unquestioning tie with any social form.（頁10）

△原譯：我們眼睜睜地看着許多躊躇滿志、才華橫溢的人們自辭於世，儘管他們中有些人並不與任何社會形態有甚麼不可解脫的聯繫。（頁14）

★現譯：我們時常發現，很多幸運的或是富有天賦的人們選擇與世長辭，他們往往感到自身與任何社會形態都沒有持久和必然的關係。

2. ◎原文：Behavior is no longer so firmly associated with birthright membership in the society that i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inherited, rather than learned.（頁61）

△原譯：外來者的行為和該社會中與生俱來的成員身份的聯繫並不十分密切，以致於在他們的行為中繼承長輩的成份

遠遠多於新近習得的成份。  
(頁52)

★現譯：在一個傳承重於習得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已經不再和與生俱來的成員身份緊緊相連。

3.◎原文：Each such adaptive shift carries with it possibilities of change and a reduction of the depth characteristic of postfigurative cultures. (頁78)

△原譯：這類適應性的轉變往往依變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內在特質的衰減而定。(頁66)

★現譯：每一個這樣的適應性的轉變都承載着對後喻文化深刻特性的改變和減弱的可能。

#### 四、段落和語句缺失及漏譯

據筆者統計，中譯本總共出現了六處不同程度上的語句缺失或段落漏譯。比如，原著在論及「後喻文化」時指出：“The essential mark of the postfigurative culture—the reversal in an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 to his child or his relationship to his own parents—disappears.”(頁71)在中譯本中，這句話卻被翻譯成了：「前喻文化的基本標誌消失了。」(頁60)且不談對原文中“postfigurative culture”一詞的錯誤翻譯，就連原文中對“postfigurative culture”基本特質的解釋在翻譯過程中也被遺漏掉了。

此外，中譯本對原著多個地方的翻譯也存在十分明顯和嚴重的漏譯現象(如頁91第1自然段、頁93第3至11行、頁116第2自然段第1至3行)。這些缺失部分主要涉及到了對毛澤東的評價、中國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領域方面的評論，筆者認為原

著或許在不同程度上觸及到了中國大陸的敏感話題，因而可能在中譯本出版過程中遭到刪節。

綜觀以上林林總總的錯誤及問題，如果僅從純粹的學術意義上來講，該中譯本的價值或許已經不大。加之受到有關核心概念和諸多詞句上低級翻譯錯誤的影響，這樣的譯本反而阻礙和誤導了廣大學者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從以上分析可見，1980年代部分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學術研究本身仍缺乏嚴謹的態度以及鍥而不捨的反思精神，同時，一些學者也未能做到尊重原著內容及作者的本意。究其根本，一方面，固然有其時代背景和科技條件所導致的相關學術研究技能不足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由於學術評價制度及機制的缺失所引發的學術圈中長期缺乏批判和質疑精神的原因，而這也正是導致此類學術錯誤長期存在並持續帶來負面影響的根本性原由。

#### 四 中譯本的負面影響及重新修改的意義

由於各種不同類型的錯誤在中譯本中還有很多，我們每一個對米德思想進行繼承和傳播的後學都會感到失望，而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錯誤已經持續存在於中譯本以及隨後的中文相關文章中近三十年時，使人感到更加心痛和慚愧。如此的翻譯不僅未能尊重原著的內容及作者的本意，同時也是對這位偉大的人類學家傾注一生所完成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的不敬。此外，這樣嚴

重的錯譯，不僅無法為國內學術界正確運用原著的理論指導相關領域及學科的研究和發展，反而造成了扭曲原著思想和以訛傳訛的負面效應。隨着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文化與承諾》的中文錯譯以及所引發的學術概念的誤用，將對中國同其他國家學術界的跨文化溝通與交流，帶來消極的影響。

米德為了探索文化對個體人格及品性的影響，以青春期、性別和社會化等問題作為切入點進行研究；同時，為了使研究的對比性更加顯著，運用更加準確的第一手資料，並使所得結論具有更加廣泛的應用價值，米德選擇捨棄優越的生活，長年生活於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及新幾內亞的土著部落當中。無論是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研究，對馬努兒童的成長和教育的觀察，對新幾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關係的探查，或是對代溝問題的研究，最終都充分證實了文化多樣性對人格和心理塑造的決定性作用，從而證明先前社會心理學對人們行為模式的描述與闡釋並不具有全人類絕對普遍的意義。米德所強調的文化決定論認為文化對人格的形成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她的一系列「證偽實驗」有力地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論，並使二十世紀前期頗為流行的生物決定論遭遇嚴重打擊，為博厄斯學派的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米德的文化決定論對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sup>⑩</sup>。

而僅就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來講，米德或許不是第一個對「代溝」進行研究的人，但她卻是將其廣泛應用於指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兩

代人之間所存在的歷史性差異的第一人<sup>⑪</sup>。在有關於代溝問題的研究中，她將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代際間溝通方式轉化為同一社會中不同代際之間獲取溝通的強大動力；同時，她也以此對社會化過程以及文化結構本身所產生的變革進行了考察和檢驗。米德對於代溝問題的研究廣泛地激發了身處不同代際人群的興趣，同時，這也使得被代溝所分隔開來的兩代人能夠以一種更加包容和理解的心理來審視社會中的種種變革<sup>⑫</sup>。她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解決由迅速、巨大的社會變革所引發的代際間衝突的方法，有助於緩解由代溝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矛盾及社會問題<sup>⑬</sup>。

米德在學術上執著的獻身精神以及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其在世界範圍內所帶來的影響，是令人十分敬佩的。正是這樣的精神和意志應該深深感染並打動每一個後輩學人，並時刻提醒我們：忠實於其在那惡劣、艱難的條件下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們每個後學所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因此，筆者謹以此文懇請學術界及廣大學者對《文化與承諾》中譯本中嚴重的學術錯誤加以關注，同時，也期待中譯本中的錯譯能夠盡早得到更正與修訂。此外，我們也應當盡快建立起有關學術翻譯作品的第三方監督評價機構，這能夠使我們最大限度地尊重原作者和原著的本意，同時也能夠盡量避免由於譯者對相關專業知識的缺乏而導致的錯誤翻譯。

同米德相比，我們所能做到的不免顯得十分渺小，但或許這也是對這位偉大的文化人類學家最好的緬懷和最大的敬意。

## 註釋

① 初版參見 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本文的考察基於其 1977 年的重印版本。參見 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Frogmore: Panther Books Ltd., 1977)。

② 關於米德的生平，參見 [www.biography.com/people/margaret-mead-9404056](http://www.biography.com/people/margaret-mead-9404056)。

③ 米德的代表作，參見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28);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itive Educ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30);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35)。

④ 米德 (Margaret Mead) 著，周曉虹、周怡譯：《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⑤ 柳士彬、楊啟亮：〈「三喻文化」與家庭教育〉(2007年2月5日)，嘉興德育網，<http://61.153.231.109/cms/jxdy/view.php?id=5022318>。

⑥ 蘆向泳：〈由「三喻文化」說開〉(2006年2月8日)，甘肅每日新聞網，[www.gansudaily.com.cn/20060208/701/2006208A0265H004.htm](http://www.gansudaily.com.cn/20060208/701/2006208A0265H004.htm)。

⑦ 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the 1970s*,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⑧ 米德 (Margaret Mead) 著，曾胡譯：《代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⑨ 周曉虹：〈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青年研究》，1988年第11期，頁23。

⑩ 周曉虹：〈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親子傳承〉，《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2期，頁51-66。

⑪ 周怡：〈論代溝的未來發展趨勢及其超越〉，《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頁145。

⑫ 黎春嫻：〈文化反哺：城市老年人社會適應的新途徑〉，《學術探索》，2012年第8期，頁46。

⑬ 鄭金洲：〈教育反哺芻議〉，《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頁26、28。

⑭ 肖正德：〈生態取向教師學習方式變革：時代境遇與實踐路向〉，《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1期，頁74。

⑮ 霍恩比 (A. S. Hornby) 著，石孝殊等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簡化漢字本，第六版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641；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編著：《麥克米倫高階美語詞典 (英語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頁511。

⑯ 參見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figurative", [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figurative](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figurative)。

⑰ 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編著：《麥克米倫高階美語詞典 (英語版)》，頁882。

⑱ 張帆：〈人類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結合：瑪格麗特·米德之文化決定論綜述〉，《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3期，頁114-24。

⑲ Mary Bowman-Kruhm, *Margaret Mead: A Bi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3)。

⑳ Theodore Schwartz, ed., *Socialization a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of a Theme in the Work of Margaret Mea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㉑ L. L. Langness, "Margaret Mead and the Study of Socialization", *Ethos* 3, no. 2 (1975): 97-112。